DOI:10.13967/j.cnki.nhxb.2020.0018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张峰林,唐 琮¹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治理体系的重要政治架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党的领导和发扬民主相统一、协商民主与集中高效相统一、互相监督与团结和谐相统一的特色和优势。分析和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历程、理论基础和实践效果,认识和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对新时代加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 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0)02-0009-06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总体要求和重大意义,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部署、规划是新时代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发展、完善的根本遵循。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形态,其核心要义是“领导”与“合作”;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政协大舞台、正事好协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1]分析和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历程、理论基础和实践效果,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有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特色优势,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一 历史逻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完善过程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一致,与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任务相统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符合中国现代化转型需要,契合中国人民民主追求的制度创新。

(一)多党合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胜利提供力量保障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遇主权危机,外部力量迫使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 2100 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国开始探索政治制度的革新,效仿和移植了西方国家的议会制、总统制、多党制,造成中国政党林立、社会撕裂、国家动乱,历史证明西方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国情,无法解决中国问题。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出现崭新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对社会各阶级、阶层作了分析,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了打败共同的敌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共同目标,中国共产党立足国家大局,联合一切可以

[收稿日期] 2020-03-20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新时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和优势研究”资助(编号:18JDSZK068);南华大学社科研究项目“新时代中国政党制度特色与优势研究”资助(编号:18XZX03)

[作者简介] 张峰林(1969-),女,湖南郴州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¹ 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联合的力量,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推进多党合作。与此相反,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奉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实行专制独裁统治。

抗战胜利后的中华民族,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国民党“一党制”和中国共产党“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中自觉、自愿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共同政治目标和政治主张下,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开展广泛、深入合作,化解矛盾、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不断扩大团结的同心圆,从而汇聚起实现中国人民终于站立起来的磅礴力量。1948年,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表示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等55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首次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1949年9月,新政协的召开,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协商建国,形成《共同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为恢复经济发展、巩固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提供了基本准则。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民主党派建设和发展受阻,中国多党合作事业遭遇考验,但是中共民主党派经受住了考验,迎来了多党合作发展的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迎来了新发展,党的十二大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扩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开启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建设进程。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被写入了宪法序言。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推进了中

国新型政党制度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发展。顺应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现实需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容与形式不断丰富,多党合作领域和层次不断拓展,政治协商的渠道和途径不断畅通,制度化建设不断推进,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制度支撑和力量保证,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供范式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出台推动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2012年《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实施意见》以及2017年《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等配套政策不断丰富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容与形式,完善和规范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机制与程序,健全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系。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提出“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全新理论,概括总结了“三个新”“三个有效避免”的特色优势。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出重要战略部署。新时代,多项配套政策的出台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定型,有利于国家制度体系的发展和健全,有利于推动制度间的衔接和协调,有利于人民实现广泛参与、共同治理保证制度落实和制度效能提高。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孕育、形成、确立、发展过程符合中国国情的需要,是历史与人民的共同选择。一方面,中国现代化转型需要凝聚广大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同时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权威,因此历史选择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具有高度整合功能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在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探索中,通过实践和比较,郑重地选择了“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2]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二 理论逻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转型、开启政治制度革新、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政党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导。《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3]435}。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主张无产阶级与民主政党联合,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与资产阶级合作,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3]435}。同时强调无产阶级要保持自身独立性、把握革命领导权。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目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阶级革命党,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政党理论指导下,建立统一战线,提出多党合作的政治主张,广泛动员、组织和整合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力量;另一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通过自身政治主张、理论政策和在革命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不断提高自身感召力、影响力,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自觉、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真诚、务实地开展多党合作。

(二)列宁多党合作思想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理论借鉴

马克思恩格斯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几乎没有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进行论述。列宁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成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在俄国开展多党合作实践。列宁提出了在国家政权中实行多党合作的初步构想,从争取同盟者的策略层面分析了俄国实行多党合作的必要性,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4]。列宁关于多党

合作的构想为我们正确认识多党合作凝聚智慧和力量的优势,有效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提供理论借鉴。列宁提出坚持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5]这对我们正确认识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有效运行的根本保证,必须不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本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在国家政权中开展多党合作的构想,创造了执政参政的政党制度模式,提出了参政党理论,从战略角度分析了多党共存、多党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建立了平等和谐的党际关系,为多党合作共事、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提供了多种渠道和有效平台,不断坚持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形成了民主的政治氛围与和谐的社会环境。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指导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根据中国实际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实现政党联合的思想,在抗日革命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积累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创立了执政党与非执政党共同参加国家政权的新模式,形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平等友好政党关系,为正确认识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有效维护了政权稳定和政治稳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丰富了多党合作理论,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提出了民主党派社会基础和性质发生了改变,创造了参政党理论,明确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基本特点。随着多党合作实践的深化,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出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开启推进我国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建设进程。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提出要协调和处理五大关系,政党和谐位于五大和谐关系之首。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面对新的统战形势和统战环境,不断丰富新型政党制度理论,推进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明确民主党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位、民主党派职能和无党派人士定义,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全新理论,总结了我国政党制度的特色与优势,指明了我国

政党制度的发展方向。

(四)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深入中国人民基因、影响中国人民价值选择的重要因素，因此，新型政党制度只有与中华本土文化相结合，才能得到民众认可并发挥作用。中华民族历来倡导“和合”精神，主张“以和为贵”“贵和尚中”“天下大同”，中国共产党有效吸收“和合”文化精华，创造了不同于西方两党制、多党制和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一党制的合作型政党制度，建立了和谐共存的党际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吸收了古代中国“民惟邦本”的政治智慧，在制度设计之初就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群众路线，从而具有广泛的利益代表性，能够有效地反映、整合和传达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的利益诉求，具有真实的民主性。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的包容思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效吸收和运用这一思想，创造了“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的民主协商形式。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符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需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适应，“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2]

三 实践逻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彰显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制度实践和具体运行中不断发展、完善，彰显出巨大的特色和优势。认识和发挥我国政党制度的特色优势，将我国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效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有效举措。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党的领导和发扬民主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2]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民主党、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自觉、自愿的选择，是保持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性质的根本保证，是开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首要前提。坚持党的领导主要是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各政党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在组织上是独立的，中国共产党不干预民主党派的内部事务。坚持党的领导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提高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政治资源合理优化配置，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2]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就是这种民主最基本的体现。”^[2]通过政党协商、政协协商有效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广泛吸收各方面的建议和意见推进科学民主决策，有效化解分歧、理顺关系，有利于凝聚共识，增强人民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实现有序政治参与，创造宽松和谐的协商氛围。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履行民主监督职能，以意见、建议和批评的形式对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通过对重大决策部署情况的专项监督和参加中共组织的考察和调研等方式行使民主监督权利，以提醒和帮助为目的，不断改进党的工作、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推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人大中占有适当比例，在政府、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在政协中以本党派身份发表意见、组织提案，通过多渠道的参政议政，在与中共合作共事中道实情、建良言，发挥自身智力咨询和政策咨询的作用，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协商民主与集中高效相统一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推进协商民主发展提供了广泛多层制度化的渠道保障。一是丰富了协商的内容与形式，规范了协商机制和程序。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政党协商、政协协商就事关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和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真诚务实协商，通过协商会、座谈会、个别交谈和书面意见

等形式反映情况、沟通思想,通过知情明政、调研考察、协商讨论和反馈办理等有效机制程序保证协商过程公平、协商成果落实。二是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人民政协中通过主动协商、积极参与、民主监督,不断凝聚共识、增进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三是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通过广集民智、广纳民意、广求民策、广聚民力,从而保证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通过协商中真实表达、理性讨论达成共识、统一思想;通过对决策实施过程的监督和调整,平衡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确保决策落实有力;通过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真正体现人民主体地位,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

中国新型政党制要求广泛、真诚、务实协商,代表和反映人民意愿和诉求,同时强调具有高效集中的优势,保证人民利益和诉求得到落实。首先,民主党派对其所联系群体的建议和诉求进行收集、整合、归纳之后才开展协商,而不是平铺、松散的直接堆砌不同的想法和意见,因此协商议题是有代表性和针对性的,从而提高协商的效果。第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利益表达渠道和平等协商平台,保证各项利益诉求有序传达到国家决策层。第三,在民主协商过程中平等协商、理性表达、达成共识有利于科学民主决策,保证决策执行的稳定性,相较于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下政党轮流执政造成的政策反复和不持续,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优势。第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友好党际关系,“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执政参政模式,有利于形成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互相监督和团结和谐相统一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关于民主党派存废问题上,毛主席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6]互相监督包括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监督和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这种双向监督以互相提醒为目的,区别于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下各政党为争夺执政权而以互相攻讦、互相反对的方式进行的相互制衡。中国共产党为民主党派建设和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支持、提出建议,但不干预民主党派内部事

务,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监督是一种高层次、非权力性的政治监督,是通过意见、建议和批评的方式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同时通过外部监督推动内部监督,促进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具有推进团结和谐的内在特点。第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维护全国各族各界人民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同时,兼顾同盟者的利益,照顾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具体利益,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我国长期执政的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我国的民主党派不同于西方的在野党和反对党,不争夺国家政权,而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效避免了政治资源浪费和社会撕裂,以友好的政党关系推进建设稳定的政权关系,创造和谐的政治氛围。第三,民主党派在履行职能中发挥各自界别特色和桥梁纽带作用,不断加强对所联系群体的思想引导、政策阐述,有利于凝聚人心,形成共识,团结动员社会各阶层群众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第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以协商代替分歧、以合作代替竞争,从而减少社会内耗,化解矛盾冲突,理顺各方关系,形成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中国土壤中形成和发展的,在实践中不断彰显中国特色和制度优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展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造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新时代坚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特色优势对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28(1).
- [2] 习近平.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 2018-03-05(1).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4] 列宁. 列宁全集: 第3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85:363.
- [5] 列宁.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423.
- [6]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34.

The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of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ZHANG Feng-lin, TANG Qio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as the basic political system of our country, i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structure of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the choice of history and people and the produ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t party theory and Chinese reality.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the promotion of democracy, the combina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centralized efficiency, the combination of mutual supervision and unity and harmony.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effects of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and understand and grasp its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building of a new type of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n China and modernize the country's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e logic